



诗歌往往是一个民族最早的美学记忆与情感记号。一部中国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诗歌的历史。要记住我们的乡愁,要有文化上的自信,亲近诗歌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之一。西方文学以《荷马史诗》作为起点,开创了它的叙事传统;而中国文学则以《诗经》奠定了我们的抒情传统。《诗经》传统充分证明:优雅、灵动、含蓄、深邃是在文化上与生俱来的秉性。同时,一切诗歌在追求美的同时须求“真”。“童心者,真心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应该“从娃娃抓起”。

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不学诗歌,他连话都说不好;虽然孔子这里所说的“诗”,主要是指《诗经》,但从一个侧面说明,诗歌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我们独特的“诗教传统”。诗歌中蕴含着美的意境,深刻的人生哲理,高尚的人生境界。学诗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教育,更是在美学氛围中塑造青少年健康的人格,培育他们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养成他们向往自然的美好情怀。

近年来,诗教正得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的重视,各类诗教活动丰富多彩、蓬勃开展。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部门联合主办,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承办的“童心里的诗篇”少儿诗会,便是其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该少儿诗会始于2015年,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本届诗会征稿范围从起初的省内外到现在的海内外;征稿数量从往届的4万多首,到本届10多万首——说明我们的社会对诗歌有着巨大的需求,无数幼小的心田渴望诗歌的润泽。

一首首从幼小的心田里飞出的歌,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飞来,从港澳台飞来,甚至从国外飞来。既有即将参加高考的“准大学生”,也有尚未进入小学的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每一首诗,都是他们展开想象翅膀的一次试飞;每一句诗行,都是他们张开智慧的双眼,对社会、对生活、对自然的深情顾盼。

以“新时代、新少年、新诗篇”为主题的第三届“童心里的诗篇”与前两届相比,不仅在投稿数量上猛增,在质量上也稳步提升。组委会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组织初评、复评和终评,好中选优,优中精选,最终将这105首诗作

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诗作,虽然不免带着点稚气,但在我看来,它们更像是未经雕琢的玉石。

与前两届相比,本届所收到的作品在表现内容上更加色彩斑斓。对自然的深情咏唱,对亲情的细腻表现,仍然是孩子们笔下写得最多的,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他们对生活的观察面更宽,所表达的内容更加丰富。他们能敏锐地感受到父母的生存压力,他们能用别致的方式写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他们能非常准确地把移动终端时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传神地写进字里行间。他们甚至开始关注“二孩”的到来对家庭内部关系产生的微妙影响。

孙莉茜同学的《朋友圈》是非常富于时代气息的一首好诗:“有一个神奇的圈/大人们叫它/——朋友圈//爸爸在圈里/时不时分享工作的感悟/妈妈在圈里/时不时分享美食的诱惑/阿姨们还在圈里/晒自拍,卖东西……//这个神奇的圈/把大人们的朋友/都圈在了——手机里”。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她则由大人们的虚拟圈跳到小朋友们的现实的“圈”,而且诗的立意一下子高了起来:“我,没有朋友圈/我更爱和小伙伴们/手拉手,肩并肩/围成一个大大的圈/我们在圈子里见大绳,跳皮筋/玩弹珠,捉迷藏/时不时/还会分享一颗/藏在衣兜里的——甜甜圈”。评委们读到这首诗都很感慨,觉得这是小朋友给大朋友们上了一“课”。它也让我想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所说的:儿童乃成人之父。

曾梓悦同学《父亲是弓我是箭》一诗所表现的,是当下千千万万家庭的一个缩影。“生活的沉重/压得父亲佝偻如弓/年轻的我/就是弓上的那支箭/弓箭愿身躬更曲更弯//为我我箭的前途更高更远”。一个叫叶恩泽小朋友在《快点》一诗中写出了普通家庭中最常见的情景:在家中,所有的人都叫他快点儿,快点起床,快点吃饭,快点洗澡,快点写字;于是他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写出传神一笔:“哦,原来我的名字叫‘快点’!”总之,孩子们对生活的观察是敏锐的,他们不再是只专注于学习的一代。他们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考。

童心里的诗篇自然不同于成人笔下的诗篇。孩子们未必都接受过正式的诗歌写作训练,但是,好诗总是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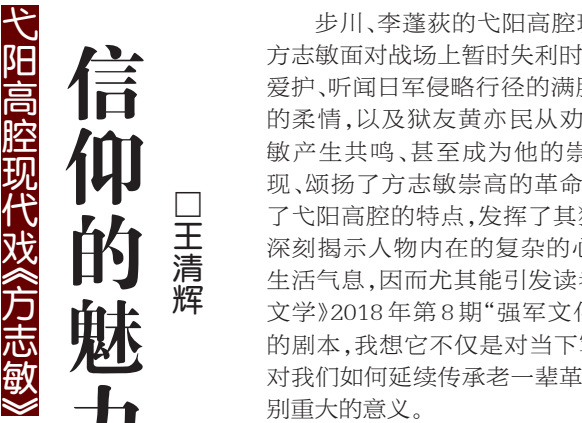
然天成,好诗总是与童心同在,好诗在孩子们开始动笔之前,早就存在于他们的心中。这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童心孕育好诗”。

丰富的想象力是一首好诗不可或缺的品质。袁晨宸的《夜》便是一首很有想象力的好诗:“月亮是弯弯的躺椅/星星是一闪一闪的路灯/蓝天是无边的大海/云儿是海面上薄薄的雾//我/坐在躺椅上/拿着鱼竿钓鱼/钓起来一个红红的太阳”。诗歌讲究“无理而妙”,这首诗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孩子们与成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孩子们似乎总能看到成人看不到的一切。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他们总能发现美和奇妙。陈绎睿的诗《手》并没有特别的意象,但整首诗却像一股清泉,自然流淌:“小河/伸出冰凉的手/就能拥抱那么多的鱼儿//小路/伸出长长的手/把下班回家的人们接回家//小树/长出绿绿的手/可以为风儿的歌唱使劲鼓掌”。

不过,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参赛的小作者,从小学到高中呈现出递减的情况;换言之,出现了“大的写不过小的”这一现象。这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诗歌的确属于孩子,孩子越小,想象力越不受拘束——童心、诗心,天然相通;二是随着课业的加重,我们渐渐剥夺了孩子们接触诗歌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诗教,开展诗歌传播活动,让好诗始终伴随孩子们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童心里的诗篇”作为“童”字系列美育活动的重要品牌,已成为江苏文化的一张闪闪发光的名片。我相信,如果能持久深入地继续开展下去,它必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把诗歌的种子撒向人间,撒向千千万万幼小的心田,让孩子们在对美的追求中开创美好未来。



步川、李蓬荻的弋阳高腔现代戏《方志敏》,通过描述方志敏面对战场上暂时失利时的自责、对狱中同志的关心爱护、听闻日军侵略行径的满腔愤懑、念及与妻母儿时柔情,以及狱友黄亦民从劝降者到受到感化而与方志敏产生共鸣,甚至成为他的崇拜者的转变,从各方面表现、颂扬了方志敏崇高的革命精神。本剧创造性地继承了弋阳高腔的特点,发挥了其独特的真切感人特性,注重深刻揭示人物内在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同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因而尤其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和共鸣。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8期“强军文化主题”专号上读到这个戏的剧本,我想它不仅是对当下军事题材文学的补充,而且对我们如何延续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理想和信念,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弋阳高腔以鼓为节,调喧音亢,特别适合于表现激情澎湃的主题。这部剧中的主人公方志敏,他有对家乡的爱,也有对侵略者的憎恨;他有对家人至亲的小爱,也有对祖国和民族的大爱;他有对生命的眷恋,也有对死亡的无畏;他一面顽强地领导了狱中斗争,教育和团结了一个个革命的同情者,一面心怀可爱的中国,相信祖国必将获得自由与解放……他说:“生有所息,思无所息”,“生一天,就要奋斗一天,这就是共产党人生命形象”……这就是方志敏的初心,也是他信仰的来源。剧中从多方面刻画了各种人物形象,特别集中在方志敏的形象上,因其心中不可磨灭的信仰,滚滚岩浆般喷发的豪情、激情和诗情融汇成情感真挚的唱词,在朗朗上口、入脑入心的节奏中呈现出来,便具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剧中大量使用了弋阳腔中的帮腔,使该剧具有了亲切的民间风格,同时一唱众和的帮腔也自然地表现出方志敏与人民大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剧中有多处改编自《可爱的中国》中的片段,如第四场里“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惊人的魅力叫人为爱慕。她的高山和大河,是丰满的肌肤上动人的肉窝。她无穷尽的乳汁,养育了几儿女四万万。可爱的中国!”以及方志敏幼时创作的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国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读起来感人至深,给人以强烈的心灵触动和巨大鼓舞。“可爱的中国”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却是对方志敏形象卓越的概括和创造:用“母亲”的形象作为“中国”的象征物,是方志敏的重大创新,在国破家亡的阴影下第一个歌唱“可爱的中国”,更体现了方志敏质朴的情感和崇高的境界。剧中第三场结尾处的唱词“舍生忘死追梦行,好梦可爱的中国”开启了方志敏酣畅淋漓的“示众”表演:在狱中军医吴小雨的眼中,方志敏“就是苦难人间活着的神”。值得一提的是,剧中运用了“滚白”来调剂声腔,同时也有利于酣畅地抒发情感和推进剧情。第二场中方志敏和黄亦民二人的“滚白”,用通俗明快的语言,交代了这两个人彼此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选择,既符合剧情节奏的需要,又不受曲牌音乐固定模式的限制,成为烘托气氛、剖白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二人情绪的转折突变在对话中“累累如贯珠然”,这一段滚白一出,方志敏面对劝降的坚拒态度及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

正是在这样的戏剧形式中,方志敏的形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沛的内心力量,不是作为历史旧纸堆里的单薄符号,而是作为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思想传统和现实关切的反抗者和坚定信仰者,重新进入了读者的视野。

由这部剧,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方志敏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坚定的信仰,因为这信仰中蕴含着他们的初心,这信仰令他们看到中国的希望,在这坚定的信仰中他们逐渐充满了力量。而敌人,正如剧中所展现的,内心苍白、空虚,即使是在狱中物质条件也相对充足,可是远远不可能获得如共产党人所拥有的信仰的魅力。共产党人是革命战士,也是丈夫、父亲、儿子……但无论在多么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坚守信仰永远是他们不悔的选择!在只有少数人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在大多数国人只顾低头顺命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追求光明,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他们如何能用青春和热血,谱写壮美的生命之歌?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仰的杰出楷模。方志敏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正气,是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良传统与中国革命伟大时代精神相结合的结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信仰诠释着共产党员钢铁铸就的意志,读到此剧,我们也能够从先烈的身上汲取能量,不忘初心,坚定信仰,并带着对于生活的热情,凝聚前进的力量。无论是昨天、今天,抑或是未来,信仰将永远扎根在我们的心中,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

王国平《本固枝荣 晋江之魂》

让一座城市触手可及

□李彦姝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和新时代中国大地的新风貌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如何生动而立体地去呈现呢?我想不仅需要历史之笔、新闻之笔,也需要文学之笔。2018年7月17日《光明日报》整版推出的报告文学作品《本固枝荣 晋江之魂》就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王国平的这篇报告文学新作以福建晋江为观察对象,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晋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果,反映了晋江人民勇立潮头、同舟共济、不懈拼搏、重义轻利等优秀品质,彰显了爱拼才会赢、敢为天下先的晋江精神。

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具有充沛的时代感。徐迟先生曾说过:“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文学。”这意味着,报告文学家需要敏锐感知时代风气、紧密拥抱时代经验、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本固枝荣 晋江之魂》紧贴反映时代思潮与时代风向的标志性事件、代表性人物,使得熟稔这个时代的读者有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与参与感。作者搜集材料注重点面结合,在有限的篇幅内,遴选了一个个精彩的片段,以点带面,以小见大,以个案见全局。他尤其注重刻画勇立潮头的晋江之子形象,通过对他们的刻画来呈现晋江人炽热澎湃的创业热情、敢闯敢为的干事魄力、捕捉发展机遇的智慧、舍我其谁的信心等,而这些人恰恰受惠于时代的哺育、时代的光照。

另外,这篇作品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储备。王国平没有自拘于“时文”的桎梏,而是渴望追本溯源,为当代晋江发展寻找历史依据。作家对晋江历史、地理、文化、经济、人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搜罗爬梳,从而使得作品根基深厚、史料扎实、内容饱满。然而,作品的历史感,却不是靠“掉书袋”式的卖弄堆砌出来的,而是很自然地将历史知识与现实境况相互穿插勾连,娓娓道来,简洁而生动,平实却深沉。这种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文风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举重若轻、化大道于无形的一种表现。

深刻而鲜活的思想性是这篇作品的一个自觉追求。作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文脉与商脉的互补中,以问题意识为驱动、以辩证思维为指引,来思考和看待晋江的发展历程。作品对晋江并非一味溢美,也敢于正视晋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短板、经历的挫折与教训,比如“假药案”“任公饭”等。正是因为作者有这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因此作品在思想上呈现出开放性 with 包容性。以历史传统为母体和根基,以时代大潮为契机和推力,晋江的发展体现了晋江人返本开新的胸襟和格局,这也是文题中“本固枝荣”的深层意蕴之所在。

作品还兼顾了艺术性与真实性的追求。报告文学并非对现实原封不动地临摹,而是艺术化地书写时代、呈现生活、塑造典型。报告文学又不同于小说等虚构性文体,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信奉“熟知此事要躬行”的立场,创作必须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实践基础之上,绝不是天马行空凭空想象的产物。《本固枝荣 晋江之魂》就走好了艺术与真实的平衡木。从艺术性角度来看,作品叙事圆熟,人物鲜活,文气沛然,情感饱满,辞章丰赡。尤其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有意借鉴诗歌的表现形式,营造出一种诗性的节奏韵律和美学氛围,从作品的段落铺排、遣词造句、意象建构等方面皆不难看出作者的匠心。就真实性而言,作品既有通过一线采访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也有大量扎实可信的间接文字资料,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力避溢言虚美、主观臆造。

报告文学在当下文坛似乎显得不温不火,比之小说等文体,读者常常低估报告文学创作的难度,甚至经常无视报告文学作家所付出的巨大心力。实则不然。为了撰写这篇作品,王国平搜集了大量案头资料。一篇7000余字作品的背后,竟然有百余份学术著作、资料汇编、报刊杂志作为支撑,作品字里行间处处埋伏着作者所下的“暗功夫”。

总的来说,从题材立意来看,《本固枝荣 晋江之魂》政治站位高而不失烟火气;从思想性来看,有理有据且发人省思;从情感表现力来看,饱满充沛且激人奋进;从艺术风格来看,气韵浑厚而不失灵动。作品叙事、写人、抒情、论理兼工,呈现了一个栩栩如生、触手可及的晋江。在作者的笔下,晋江这座城市不只是一个符号、一张名片,而是被写成了一首诗,写成了一个人,被赋予了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灵魂。

我们看到,2017年的湖南长篇小说,从聚焦历史人物到直面当下现实,钩沉世道人心,纵览生存百态。特别是代表性的两部长篇《迷城》和《平步青云》,圈点权力支配下的人物命运沉浮,让人慨叹唏嘘。

马笑泉的《迷城》是2017年湖南长篇小说重要的收获。这部30万字的长篇,从题材上讲,很容易让人想起“官场小说”之类似是而非的定论,但事实上,官场小说或政治小说此类的题材标签,无论之于《迷城》或其他相类似的小说,都无法穷尽小说本身的复杂性——重要的并不在于给此类小说贴上什么样的主题标签,而是如何尽可能在结构剖析和艺术特质的意义上,真实还原小说的特有样貌。从湖南当代小说的精神谱系角度而言,马笑泉的《迷城》无疑是处在了阎真《沧浪之水》和王跃文《国画》的延长线上,或者换句话说,《迷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融合了《沧浪之水》和《国画》的流风余韵。《迷城》的主人公,是从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空降迷城担任县委书记的杜华章,在杜华章身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朱怀镜和池大为的双重影子:同样是置身官场,杜华章既有朱怀镜的那种文人情怀,也有池大为式的知识分子担当;同样是情场遇红颜知己,杜华章和静云轩茶馆主人梁静云的情感纠葛,则有“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的点到为止,这跟《沧浪之水》以及《国画》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基本如出一辙。即便是故事的结局,《迷城》跟《国画》《沧浪之水》也大致相似:主人公杜华章到最后实现了由县委宣传部长官至一县之长的仕途升迁,可谓是平步青云的功德圆满。

当然,如果单从故事涉及的官场级别来说,《迷城》较之《国画》和《沧浪之水》所涉的厅局级,可以说是下沉了一步,即《迷城》揭露的是县一级地方权力的运作真相,但丝丝毫不会影响小说的精彩程度。在小说中,迷城之谜的第一个谜,就是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的非正常死亡,小说的叙事结构也是由此做起了文章,即由鲁乐山的非正常死亡,牵扯出迷城官场的前尘旧事,小说以叙事主人公的回忆讲述了迷城官场的是非纠葛,而与此同时,围绕这起非典型性命案,如何处理善后则直接引出了故事的下文。我们看到,扑朔迷离的官商关系,错综复杂的帮派团伙,小说行文沉稳,既见解析的细腻绵密,



又有叙述的错落有致,就此而言,马笑泉笔端所触及的,无疑是基层权力毛细血管的流通状况。

就权力的毛细血管机能而言,我们看到《迷城》的叙事其实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操作性和纪实色彩,或者说,小说提供的艺术真实,让我们更加清楚现实生活的真实背后是怎样的一副因果逻辑。以清理护城河为例,迷城的护城河本来水流量就小,加之多年淤积以及沿河两岸居民随意倾倒垃圾,有些河段看上去跟臭水沟一般,但迷城作为古城,其精华又在这条河上,护城河托起的六座古桥是迷城的一大亮点。杜华章刚到迷城考察的时候就看出了这点,尽管清理河道是造福于民的好事,但是在GDP思维主导政绩观的现实背景下,花钱清淤并不能提升迷城的GDP,因而谁也不愿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如果经济效益并不显著,但是能成为政绩工程,这事也早有人办了。你拓宽一条路,造座新桥,铺个广场,或者筑起一座宏大建筑,上面的领导来视察,不用解说一眼也能看到,印象分就上去了,对将来提拔有帮助。你造个广场,无论在上面扔多少垃圾,广场本身不会消失。你让河水变清,如果老百姓环保意识还是老样子,过两年又会回淤,他们也绝不会记得从某年到某年,河水变清,是某某某的功劳。”

我们看到,看似简单的生活现象,里面其实大有文章。在小说中,权力运行的歌曲门道和现实逻辑,《迷城》一一为我们娓娓道来。置身官场的小说主人公杜华章,即使想有所作为,造福一方,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现实的逻辑。“如果上头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这条河想不干净都难。”但问题是,人人要坐等那一天的到来,生态环境说不定已经破坏到难以逆转的地步。也正是在这种故事背景下,小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直接呼应了现实政治,换言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绩观的现实折射,像一缕清风,沁入人心。我们看到,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空降的杜华章只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综观整部小说,我们看到,《迷城》的情节张弛有度,语言平实而醇熟,书法、诗词等传统文化元素在小说中的穿针引线,无疑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

如果说,马笑泉的《迷城》是在现实层面对权力的毛细血管展开了精微的解析,那么,肖仁福的《平步青云》则是从历史的角度,试图深入到权力的中枢神经内部,一窥权力的奥秘。作为肖仁福写作计划“李鸿章人生三部曲”的开篇之作,肖仁福的《平步青云》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有意无意效仿高阳的《胡雪岩全传》——《胡雪岩全传》勾勒的是晚清首富胡雪岩风云际会的传奇人生。与高阳本来就擅长历史小说相比较而言,肖仁福则更倾心于当下现实,在《平步青云》之前,肖仁福就出版有长篇小说《官运》《位置》《心身》《仕途》《平台》等,均是现实题材的官场机关小说。而就传记小说本身而言,虽则小说允许有艺术的加工,可以有虚构的成分,但不必完全拘泥于史实,但肖仁福的《平步青云》欲在已有的琳琅满目的李鸿章传记著作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

就小说本身而言,《平步青云》并没有像一般传记小说那样将故事从头说起,以李氏呱呱坠地展开叙述,而是截取李鸿章30岁至40岁期间的成长发迹史。众所周知,虽然后来贵为朝廷重臣,但是李鸿章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平步青云》中,我们看到,李鸿章后来的平步青云,其实还是得益于他的“政治正确”跟对了人。客观而言,肖仁福的《平步青云》虽则展现了封疆大吏权力跌宕起伏的一个截面,但小说的精彩之处,实际并不在于勾勒李鸿章平步青云的起步过程,而是将人心的玄妙、人性的幽微铺展得淋漓尽致。比如在面临宦海仕途的关键关口,李鸿章当时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正如日中天有钱有人有粮的和春和大人,另一个是刚刚兵败身体虚弱的曾国藩。当此之时,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洞察力,成就了他后来的平步青云;他并没有非常势利地选择和春站队,而是非常富有远见地选择了曾国藩作为自己的导师。

以这两部长篇小说管窥,2017年湖南长篇小说,既关注大中国的大时代变迁,也聚焦小地方的小人物命运,或以历史镜照现实,或以现实叩访历史,就此而言,这些长篇小说提供的是颇具现象学意味的地方现实题材。

现实主义的『地方性』与『现象学』

□唐伟